

# 出川見聞

樂恕人

## 抗戰採訪錄第一章

### 萬里之行始於今日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（公元一九三六年）的初夏時節，我從故鄉成都前往首都南京，目的是投考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新聞學系。

從成都到南京，那時期祇有兩條交通路線：一條是水路，由成都郊外錦江坐木船沿岷江經樂山縣到川南重鎮宜賓，再換乘輪船順大江東去，直放石頭城下。另一旅程是先從成都坐汽車沿成渝公路到重慶，再由重慶換乘輪船東行。當年中國航空事業還在初創階段，滬蓉航線雖已開闢，但僅有郵件運送，尚無旅客的業務。

蜀吳水程，從古代到民國，一直暢通了二千多年。三國時代，蜀漢派了特使費禕到吳國去訪問修好，就從成都南門外錦江下船，直航吳國首都建業，即是如今的南京城。爲了這次外交遠行，諸葛丞相特地在錦江橋畔爲費禕祖餞，他望着江流，高舉酒杯祝賀道：「萬里之行，始於今日！」從此，那座錦江石橋即改稱爲「萬里橋」，

用來紀念這樁歷史大事，萬里橋也就成爲成都名勝之一。

唐宋以後，這條水路仍然是出川的捷徑。大詩人李太白和蘇東坡，第一次離家外遊，也是沿着岷江長江東去。他們在水程中，曾經吟出極爲優美的詩篇，留給後世欣賞。

這條水路，平時是商旅的交通孔道，戰時也常常變成用兵之地。中國歷史上最著名的大戰役之一，晉朝名將，益州刺史王濬征伐吳國，就在成都附近岷江中修造兵船，訓練水師，然後照着這條水路，東下遠征，打到建業（今之南京）城下，降伏了吳主孫皓，統一了全中國。

「王濬樓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氣黯然收。千尋鐵鎖沉江底，一片降幡出石頭……」我們至今讀到唐代大詩人劉禹錫這首西塞山懷古詩，還可以想像得到，一千六百多年前，晉國水師在大將益州刺史王濬的統率下，浩浩蕩蕩，從成都附近的岷江中出發，去遠征迢迢萬里外，建都在現代的南京的吳國；軍容是如何的強盛，而晉吳在長江

中戰鬪又是怎樣的劇烈。

到了民國二十年前後，成渝之間的「東大路」，改建成了「成渝公路」，交通情形就有劃時代的轉變。成渝公路全長約五百公里，旅客們可以用兩個白天的行程，來往東西兩州的首邑重慶和成都，較之坐船便捷若干倍，而且又不再冒岷江長江中風波之險。於是，成都到重慶的一段水上交通逐漸蕭條，而成渝道上熙熙擾擾，局面就煥然一新了。

四川省公路局的客車，使用美國道奇汽車公司的引擎和輪胎等件，在當地配上車身，有木椅座位三十上下，搭載旅客，行李另由卡車裝運。公路既是砂石築成，自然不能和現代的水泥或柏油公路相比，好在路面還相當寬闊平坦，行駛時顛簸震動不大。座椅上，旅客們多用衣物墊起來，藉可增加長途行駛的舒適感。

出川的同伴，有舍侄昌國及中學級友楊慈品君。我們自成都東門外牛市口車站出發，不一小時即到成都平原盡頭的龍泉驛鎮。初夏的平原上

，綠禾葱翠，一望無際。星羅棋佈似地農舍，圍圍繞着修竹，小橋流水，風光清麗。

### 天府之國精華區域

車過龍泉驛，開始進入四川盆地中岷沱二江夾帶着的邱陵地帶。赤紅色的土壤，生長着蒼松翠竹，小山山勢略有起伏，公路蜿蜒；我們生長平原，看慣了肥沃的黑色地土，至此左顧右盼，覺得風情迥異。

成渝公路的中途站是內江縣。內江是四川省的一等縣治。富庶繁華，盛產砂糖和水菓蜜餞食品。從成都經簡陽、資陽到內江的途程上，可以看見邱陵地帶中，處處是水菓園，特別多的是橘子園林；和高高低低層層相接的梯田映帶，沒有一些荒地，愈發看出四川盆地的肥沃膏腴。

民國前後，內江人物頗不平凡。有的揚名青史，有的飲譽環球。前者如黃花岡一役的革命領袖喻培倫，民國成立後追贈大將軍，以揚他的對辛亥革命的懋蹟勳猷。又有以「公孫長子」化名馳名當世的余培初，和羅世勳等，都是對革命有過功績的黨人。後者有國畫大師張善子，張大千昆仲，一代人豪，為內江縣增加異彩。

當晚旅客在內江城裏住宿旅店，翌晨起行。入夜的內江，電燈輝煌，市廛興盛；糖菓店門面之大，食品之多，是內江的特色。可惜蜜餞水菓，多失了原味，甜得膩人，令人不願多吃。直到抗戰末期，內江的水菓蜜餞，才有了改進。

內江附近的自流井、貢井，是中國有名的火井鹽場，產量可以供應西南一億人口食用。鹽井

採法雖然古舊，但因產量豐富，取之不竭，用之不完；民生供應充裕，鹽商也盡成富翁，自流井貢井後來改稱「自貢市」，距內江僅數十華里，於是糖與鹽這兩大民生用品的產銷，更使得內江成了四川內地的商埠，也是「天府之國」的精華區域之一。

內江旅店僅供住宿，旅客須得在外進晚餐。本地因為糖鹽工商叢集，餐館自然也多考究，所烹川菜，不亞成渝兩地。第二天天色黎明，旅店夥計就大叫，「上成都」「上重慶」的客人上車了，叫得旅客急急起身就道，以免就誤。行客的早餐，幾乎每人全都一樣，一碗豆漿或是酒糟麪子煮雞蛋，加上一兩個菜肉包。燒餅油條那時還沒有流行到四川，至於牛奶和麵包，甚至黃油，那時期四川人更未曾開過這種洋輩。

車出內江三十華里，就得在樺木鎮渡過沱江。江上無橋，汽車和人，都得乘巨型木筏過江。好在江流平靜，渡口江面也僅約有五十碼之遙，過渡也很容易。

內江一帶，沱江綠水，曲折傾流，波平如鏡，和兩岸的赤色邱陵形成一幅美麗的景色。經過隆昌榮昌二縣，這一帶的特產是夏布，細潤堅牢，分為米黃色、白色淺藍深藍各種顏色。入夏的四川各縣，講究衣着的仕女莫不喜歡穿着夏布衣衫，涼爽之外，人人都有些兒瀟灑輕快的樣子。

快到重慶之前，公路要經過一處較高的山地，名叫老鸞岩。這一處公路建築的奇妙，在全世界也不多见。在一座山上，公路按螺旋式上行，再在山頭以石橋跨接在對山頂上，然後穿山洞進

入坦途。因為當地山勢和坡步的關係，其他設計都無法通過；否則便要繞道數百里。這一處奇特的工程，是陝西籍的老留德工程師李儀祉先生的傑作。他在柏林工科大學專習土木工程，回國後在陝西興辦水利，造福蒼生。民國十六年四川軍人劉湘督辦重慶市政的時期，開始修築成渝公路；從重慶一出來，就遇上老鷹岩的困難工程。劉湘經人介紹，聘請李先生入川就任重慶市政府顧問工程師，由他設計，建造了這段偉大而奇妙的公路。成渝公路通車後，來往汽車經過老鷹岩，旅客每每停下來儘情欣賞。

### 嘉陵江色石黛碧玉

車過老鷹岩，不久就到歌樂山，已算是重慶的郊外；再前行到化龍橋，立刻看見嘉陵江，開始進入郊區。嘉陵江山青水綠，形勢風景較沱江更壯闊，更清麗。沱江像一幅濃艷的水彩畫，嘉陵江却像南畫丹青。

詩聖杜甫在唐廣德二年（公元七六四年）春，從四川北部的梓州（今三臺縣）遷到閬州（今閬中縣），準備沿閬水（即嘉陵江）入長江出三峽，即曾吟過一首閬水歌道：「嘉陵江色何所似？石黛碧玉相因依。」可見綠色的嘉陵江自古及今，千秋不易其美。近人劉傑佛在其名著「憶祖國河山」中，敘述到嘉陵江時，曾有贊美的話道：「以全國江水奇秀而言，惟嘉陵、富春、及瀟江堪稱上選。」

唐玄宗嘗命名畫家李思訓、吳道子各寫嘉陵江圖，傳為國寶。當代名畫家張大千、黃君璧等

，也畫過嘉陵江中最美的小三峽風光，山水雲霞蔚為奇景。

從化龍橋沿嘉陵江經上清寺、兩路口，才算到達當年重慶的市區；在兩路口上，即可眺望另一面的長江風景，浩浩蕩蕩，自西流向東去。

重慶就像一個半島，位於長江和嘉陵江的合流處，三面環水，一面有金碧山雄據在上，地形險要。四川人說：「天生重慶，鐵打瀘州。」足見重慶自古不凡。四川的政治文化中心雖在成都，但經濟中心却在重慶。四川所產的桐油、豬鬃、藥材、綢緞、榨菜、皮毛等等商品，全匯集在重慶裝輪從長江運往川外。甚至陝甘滇黔的某些貨物，也有先運經重慶再運送出川的。自然，從外國和外省運銷西南的貨物，幾乎全部由長江口岸上溯長江，運到重慶，再分銷全川和隣川各省。

因之，重慶事實上是中國西南最大進出口商埠。市廛繁華，工商興盛。四川人早就叫它是一小上海了。

重慶不但經濟繁榮，而且形勢險要，山水壯麗。嘉陵蜿蜒，長江奔放，南山巍峨綿互，市區層次時立，真正顯得山高水長，氣象萬千。

但在抗戰以前，四川本省人，特別是川西成都一帶的人，却嫌重慶俗氣，有一首花鼓民歌嘲笑它道：「一進重慶城，山高路不平；口吃兩江水，笑貧不笑淫。」因為它是商埠，酒色爭逐特別盛行，所以風氣不太淳良。

遠的史乘不去講，就從民國前後說起，有些傑出人物，不能不在此軫懷崇仰。

### 大將軍鄒容和石青陽

第一個了不起的人傑，應該數辛亥革命前的鄒容。他以十九歲的少年，奔走革命，活躍日本和上海一帶；他所著的「革命軍」二萬多字長歌，正氣磅礴，深入淺出，成為開創新時代的先聲。國學泰斗革命先進的章太炎為他的「革命軍」作序，並在其所辦的蘇報上發表，宣傳。後來清廷震懾，竟在上海英租界控告章太炎的蘇報，逮捕太炎先生，鄒容慷慨投案，不願牽累蘇報；鄒容與太炎先生同時入獄，容竟因虐待而病死獄中，才不過二十一歲。

國父在南洋鼓吹領導革命，就印製了「革命軍」幾萬冊，到處分發給華僑，南洋一帶才播種了民族革命民權革命的排滿思想。

民國建立，臨時政府封贈鄒容為大將軍，設醴招魂，大總統孫公還親往拜祭。

此外，如對辛亥革命，討袁之役有過大貢獻的革命黨人，出身重慶的有：曾任四川省議會議長、行憲政府大法官的李肇甫（伯申）；具俠士風誼的革命黨領袖之一的朱之洪（叔癡）；贊助國父排滿倒袁的健將石青陽、楊庶堪；革命黨人又兼學者的向楚（仙樵）、任鴻隽（叔永）等等。

「地靈人傑」，觀於巴縣，至今令人景仰。抗日戰爭前幾年的重慶，因為水道交通直達京滬，工商繁榮，成為西南最大的內陸商埠；所

以在地方建設上，也比其他城市略較進步。市區大約分為上半城和下半城兩部，大街通衢，早已修築了三合土的馬路，有電燈、自來水、電話等現代化都市的起碼條件。

我們到達重慶後，第一件事便是打聽船期，訂票前往南京。那時，中國第一家辦理現代旅行業務的「中國旅行社」，不記得在重慶有無分社？我們也不去選擇，早已決定搭乘「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」的輪船出川，順利訂好該公司巨輪之一的「民權輪」直航南京。

在等候啓航的幾天當中，我們除了遊覽重慶市區風景名勝外，所見所聞，心情極端興奮，也很感慨。三個年輕小夥子，懷着「上京趕考」的心願，即要遠離家鄉，前去萬里外的首都，為個人的前程而奮鬥，同時也是為獻身報國的開始。想着諸葛亮「萬里之行，始於今日」那句名言，我和同伴在那幾天的心情，真是一言難盡的。

在還沒有敘述遠行之前，趁此離川前夕不妨略為提及四川在抗戰前的一般情況。

四川這塊土地，古來有「天府之國」的美名；論面積之大，人口之多，比之亞洲的日本，歐洲的法國，也相去不遠。再說物產的豐饒，却較日本法國還有過之。

講形勢，四圍崇山峻嶺，中間交錯着平原和邱陵地帶。長江西自而東，橫貫南部、嘉、岷、沱、瀘四大河流又自北而南，縱貫全境。水路縱橫，大小陸路又密佈如蛛網。

從戰國時代到秦漢，到唐宋，到元明清，這塊土地就被帝王將相，英雄豪傑爭相據用，演在

歷史上許多幕壯烈的戲劇。這兩千多年的治亂興亡，內憂外患，簡直就是中國的一幅縮影，一個代表地區。

遠的史乘不及細述，祇以我少年時期記憶說起，四川十足表示出：「天下未亂蜀先亂，天下已治蜀後治」的局面。

國民革命在北伐成功以後，四川表面服從中央，軍政統一。而事實上四川軍閥，羣雄割據戰禍不息。雖然地大物博人衆，但是民生困厄，建設落後，實在出乎想像之外。

### 秦失其鹿軍閥割據

民國十八年國民政府奠都南京以後，四川大小軍閥林立。名義上他們也是國民革命軍某某軍長，以及什麼督辦，省主席之類的名位，服從了中央；但事實上，擁兵自重，各不相讓。對於中央政令，陽奉陰違，在自己統治的地盤上，各自爲權爲利，胡作妄爲。中央政府形式上統一了中國，而面對着的局面是：外則列強壓境，特別是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野心和行動，更形暴露；內部又爲了共產黨的興兵作亂，逐漸猖獗；因之對各省軍閥的割據，採取了懷柔政策，封疆列土，希望他們在中央領導下，共同來建國，共同去抵抗外來的侵略。

四川軍閥們就在這種大局之下，「天高皇帝遠，猴子充霸王。」你爭我奪，誤國禍民。

寧漢分裂時期，四川軍閥們也順着有過短暫的分裂，劉文輝鄧錫侯等擁汪，劉湘楊森等則擁蔣，國民政府統一安定後，四川軍閥們也順着平

靜了下去，全都歸順了在南京的中央。

但是，四川的割據局面還是照常存在着。

民國二十年前後的局面是：劉文輝的第二十四軍霸佔着四川西南大部分，田頌堯的第二十九軍佔四川正北，鄧錫侯的第二十八軍佔川北偏中，劉湘的第二十一軍佔四川中東大部，楊森的第二十軍佔川東，其他還有獨立的師長如羅澤洲、李家鈺等，則在各軍之間的夾縫地帶分據幾縣十幾縣。當年四川的寧屬雅屬還未割撥給西康建省時，一共有一百四十七縣，有七千多萬人，各軍各師，有的是地盤存在着。

民國二十三年在江西的「紅軍」突圍西竄時期，四川的省主席已由劉湘取劉文輝而代之，其間經過一場川東聯軍，西征打敗劉文輝的內戰；結果在二十四年初劉湘經中央明令發表爲四川省主席，劉文輝則屈就西康建省委員會委員長。那時正遇上紅軍過境；從川康邊界掠過，其中徐向前賀龍兩部還短期盤據川北的通南巴一帶，威脅成都，震動重慶。

劉湘和各部軍閥的部隊，並不能協力抵禦赤潮，不得已敦請中央派兵入川，驅除境內的紅軍。中央先派賀國光率領的參謀團到重慶，隨着又派康澤的別動總隊所屬第一二三大隊入川，更由中央軍隊協防川省，掃蕩川北徐賀兩部的蘇區，才把川省的危局安定下去，也才把川省直接置於中央勢力統治之下。

可是四川老百姓的災難並沒有立即解除，祇是心理上較爲安定，以爲從此「中央」來了，一切可望好轉，民生可以改善。

那些年月裏，在軍閥們的割據統治下，老百姓每年對「軍政府」所繳納的田糧，早已預收到民國好幾十年，而其他苛捐雜稅，名目繁多，層出不窮。

現在回想起來，真覺得四川太富了。以軍閥們那樣的窮搜濫括，而老百姓仍然渡着小康的局面。四川農地的大小地主不用說豐衣足食，就連自耕農和佃農，也無不衣着充足，一年到頭，每日三餐白米乾飯。最窮苦的區域僅川北一小部分，要吃雜糧和小米合煮的稀飯，但是是由天災造成的饑荒，可以說是從來沒有過。只是人禍相連，不大不小的內戰，和征糧抽稅，老是糾纏着老百姓，永不得安息。

軍閥們搜刮的民脂民膏，大部用來培植軍隊，藉以鞏固和發展自己的勢力；另一部則用來置產業，蓄財富。四川省最大的地主，就是第二十四軍軍長劉文輝。他的田產在川西南富庶之區，地連千里；他的房產在成都和其他大小縣內，也是鱗次櫛比。

至於說對統治區內的建設，或是對民生有利有益的事，祇有楊森和劉湘在成都當政的時候，還略有表現。但是，說來怪可憐，也太可嘆，從民國初年到抗戰爆發前的二十五年歲月中，除了少數地區建設了點公路、公園、馬路、圖書館醫院、電燈之外，全四川竟至沒有一條鐵道，省會成都竟至沒有自來水和電話。

在另一方面，四川老百姓除了繳納重重的賦稅以外，各地治安不寧，土匪出沒；一遇上內戰爆發，散匪變成股匪，人民就在軍和匪的擾亂中

過着驚恐的生活。同時，四川民風雖然淳樸，但是愚昧，落伍；最主要是鴉片煙流行，川人健康的不良，社會的黑暗加深，大煙正是主要的毒害之一。自然，中央勢力入川以後，各方面逐漸有了改善。田賦稍形減輕，大煙嚴格取締，軍隊開始整編，治安有了防範；四川老百姓似乎吐了一口長氣，盼望着好運道降臨！

### 帝國主義的侵略站

還不用歷數全川的內戰頻仍，民生不安；即以省會成都而言，抗戰前的局面也實在太不像樣。省會是全川首善之區，有七十萬人口，是中國歷史上的名城，而且還是若干代偏安割據的國度的首都。那最壞的十幾年中，全成都竟由劉文輝、鄧錫侯、和田頌堯共同佔據；由劉的部隊佔據西南城廂，鄧的部隊佔據東城，田的部隊佔據北城。城區內竟成三分天下，兵士們常常殺人越貨，或是械鬥，各有各的勢力範圍；市民向各軍照樣交稅服役，各事其「主」。後來成都治安太壞，民怨沸騰，三軍長才協議組織「三軍聯合辦事處」，由劉文輝的副軍長向傳義（字育仁）出任辦事處長，組織聯合巡查隊，日夜週遊市區。向處長殺人不能眼，鐵面無私，亂兵盜匪從此消聲斂跡，成都市內才恢復了安寧。

四川自然也犯着中國全國所患的民族病。比較說來，四川人所患的貧和愚兩大民族病症，後者重於前者。軍閥們的統治下，對於民生疾苦已經不在他們注視之中；對於教育問題，更不在乎。受教育的比例極小，文盲太多。

以一個七千多萬人口的省區，僅在成都重慶有三所大學，在成都的四川大學，和在重慶的重慶大學後期改成國立大學。在成都的華西大學則是美英教會所辦。其他專門學校在成都雖有設立，大體說來都不夠充實和進步。中學小學比較普遍，但連小學都不是義務教育，許多農家子弟，頂多進過小學，連初中都無力升學。而一般比較富有的自耕農和地主的子弟，有力量升學也不進學，仗着田地可以生活，竟對受教育視為不必要。這是民間的陋習，而軍閥們竟也不問不聞。因此，四川七千萬人口中，不知有多少文盲，也不知有多少未曾受過現代教育。這是小貧大愚的最顯明的現象，四川人並不因生長「天府之國」而倖免。

重慶的繁榮，除了它的地理條件外，還有不得不指出的特殊由來，即是帝國主義侵略下添給它的重要性。本來，重慶深居內陸幾千里，如果國家正常，它本可以安然無恙；其奈清末積弱，遭遇各帝國主義的侵略，歷次抵抗外國作戰失敗，在好幾次不平等條約下，重慶最後也成了列強侵略的中心地帶之一。

公元一八四二年（清道光二十二年）中國因鴉片戰爭失敗，和英國簽訂的江寧條約，應為第一次所簽訂的喪權辱國不平等條約，當年的五口通商還祇限於沿海口岸。

到了一八五八年（咸豐八年）清廷同英法簽訂天津條約後，長江下游的口岸遂被迫開放，列強有內河航行權，軍艦商船長驅直入，門戶洞開，不但早無海防，更進而連江防也喪失了。

再到一八九五年清廷與日本因對朝鮮問題作戰失敗，在日本簽訂馬關條約，開放沙市重慶等地為商埠後，長江上游也變成了列強的侵略站。重慶，乃至整個四川，就直接在列強軍事和經濟勢力的威脅下了。

### 民生公司成功因素

從此，重慶設立了英法日各國的領事館，各國不但商船可以自長江上溯重慶，而且軍艦也開到重慶江中。於是，重慶不幸而變成國際性的商埠，也變相地增加了它的繁榮。

我們乘輪出川前夕，在重慶雖然看見山河壯麗，民稠物豐，因而興奮；但同時也看見長江中各國的軍艦商船船艦相接，又因而感到國家仍然是半殖民地狀態，帝國主義軍事經濟力量，竟然深入腹地，所以為之感慨。

六月底，我們搭乘了民生公司航行長江的巨型客貨輪『民權輪』直航南京，三個月青年有無比的興奮，又有滿懷獵奇的心情，在頭一晚上搬進了輪船，在有輪位二三十名的統艙中渡夜，靜候第二天凌晨啓碇航行。

抗戰前，長江航業界在列強的宰割中，形成英、法和日本的世界，英國勢力最早最大，有太古、怡和等各家公司的輪船，法國有聚福公司，義大利有義華公司，日本有日清公司，日本郵船株式會社，而中國只有『招商局』勉強維持自己的長江航運，但其勢力幾乎不能和列強任何一國相比。到了民國二十年前後，四川出了一位實業家盧作孚先生，他約集幾位志同道合的朋友，



純粹以民間資本，創辦了『民生實業股份有限公司』，主要是航運，其次是紡織廠。

關於航運事業，最初只有幾隻小輪船，航行四川境內的長江沿岸，因為他本人和同事们清塵苦幹，經營現代化，所以業務蒸蒸日上，慢慢由川江而發展出川，最後竟擁有大小輪船數十艘，其業務由上海而及全長江以達川南的宜賓，也就是金沙江開始改稱長江的最上游。

民生公司的聲譽日隆，其對貨運的準確，妥善對客運的親切週到，愈發增加了業務。浸浸然在長江中外航運界中，大有後來居上之勢。

民生公司的崛起，還有一項重要的因素。當年國家正面臨一個重要的歷史階段，一般國人的愛國心非常激動，排外情緒極其濃厚。

民國二十年『九一八』，日本帝國主義侵佔了東北三省，建立偽滿帝國後，又着着向華北進逼，局勢一天比一天嚴重。國內則江西剿共戰事規模漸大。最後紅軍突圍，由西南竄擾到西北，十幾省動蕩不寧。

在內憂外患極為嚴重的局勢下，中央政府雖然勵精圖治，以『安內攘外』為最高國策，一面剿共，一面建設；但中央的政令事實上不能貫徹到全國，各省區軍閥割據，且有此起彼伏，大大小小的地方性內戰。因此，一般國人，看到國家的危急，特別是對侵略迫害最烈的日本帝國主義，仇恨和抗拒的意志特別強烈，情緒特別高漲。因之，以學校及民衆團體為首，掀起極度熾烈的愛國運動，其中最具體的表現即在要求抵抗日本的侵略，由各種排日運動為開始，進而要求

政府抗日作戰為最後目的。

長江中日本航運成為民衆排日的目的之一，一般人都不願乘坐日本的商輪，不願由日本商輪運貨，同時，更為了廣泛地排外，對英法在長江中的航運，也有過稍遜於日本的抵制。在這種情勢之下，民生公司以本國民間的航運興起，以經營有方使業務日隆，所以在愛國心和本身優秀的雙重條件下，成為中國實業界的新星，成為長江航運界的國寶。

### 重慶山城「口吃兩江水」

我們所乘坐的民權輪是民生公司幾條巨型江輪之一。他們的船舶，不論噸數大小，一律貫以『民』字，如民族、民權、民生、民本、民有、民享、民治等等。民權輪多少噸位，我已不復能記憶，也無從查考；反正，長江中的航輪，最大的祇能由上海開到漢口，其次行駛到宜昌。宜昌以上，因為要航行三峽，有灘有峽，巨輪不能通行。

民權輪停泊在重慶朝天門碼頭，正是嘉陵江與長江的匯合處。兩江合流的江面上，有一條水線顯然可見。初夏時節，長江洪流湍急奔流，水勢浩蕩；但嘉陵江水却比較清澈而平靜。民生公司的輪船一律使用醬黃帶赤的油色，在碼頭上停得有三艘，其中以民權為最大。我們上船的晚上，碼頭工人正在搬運一罐一罐的榨菜上船，通晚忙碌，燈光明亮，人聲嘈雜。我們在統艙中初次嗅着輪船的機械油臭味，但因為心情好奇而興奮，也不覺其油臭。外面雖然喧囂一片，我們深宵

也就朦朧睡去。

第二天一大早醒來，江上的清風，帶給人無限的爽適，開船前銅鑼大振，船上人呼請非旅客上岸，繞船一週後，民權輪放出幾聲驚心動魄的汽笛，八時啓碇。這一切，使我們初旅的年青人，感覺新鮮而有興趣，至今三十多年了，印象還很清晰。

輪船從嘉陵江開進長江時，迎面就意外地飛駛過一隻小汽艇，艇上插着一面旭日紅輝的日本海軍軍旗，艇上站着幾個黑黝黝，健壯兇惡的日本海軍水兵。他們的小汽艇在朝天門兩江江面上縱橫亂駛，把江水拖成一條條的白浪，騷擾得江面波濤洶湧，許多小木船四下躲避。民權輪船身巨大。幸得安然航行。可是在旅客們的心中，頻添一件不愉快的印象，我們莫不怒目而視，口中不斷以惡言惡語嘲罵。原來朝天門長江的南岸，有一處小鎮叫彈子石，是日本總領事館的所在地。那江邊經常停有兩三艘日本的軍艦，那橫行江上的小艇，就是日本軍艦上放出來示威遊行的。

我們輪船經過另一處碼頭，有一艘日本商船正奏出音樂，船上有中文標語，寫明歡迎旅客乘坐，船票折扣之外，還有洋布洋傘贈送等等。可是船上似乎很空，沒有幾個人影。岸邊上，有一團團的羣衆，在那兒指手劃腳地叫罵。有幾個想去乘船的鄉下人，還走不到船上，已經給羣衆高呼怒罵，並且用小石塊拋擲，嚇得不敢前去乘坐，回頭跑掉了。

輪船進到長江，遂加快馬力，鼓湧速行。我

們同望重慶城，只見江邊木屋，重重疊疊，如像鳥籠子放在木架上；城中的洋樓大廈，隱約露出一些在木屋叢中。兩江合口處漸漸消失，只有長

江的洪流，和南山葱葱鬱鬱的峯巒，還不捨地送入我們的眼簾。再會吧，重慶！年青人暫別它而去，誰又料得到僅僅一年多以後，這一個「口吃

兩江水」的山城，就膺任中國陪都的榮銜，肩負起中華民族空前抵抗異族侵略的歷史任務，成爲戰時首都八年之久！

# 從東大附中到中央大學

秦濛生

## 大學生活回憶

### 孫傳芳講演齊燮元捐錢

每年六月九日爲南高東大中大校慶，本年六月七日，係星期日，因此提前於是日在中樞中央大學新校址舉行，我在南部服務，很少參加校慶，今年是日適逢休假，同時爲參觀新校址，會晤老同學，故於是日上午九時到中山堂集合，乘校車前往。到校後除參觀及開會以外，即與老同學殷殷話舊，往事歷歷猶在目前，風景不殊，舉目有山河之異，感慨萬千。歸來聊述舊事以博同學之追憶，或亦爲「中外」讀者所樂聞。

我是民國十四年考取東大附中高一的，十六年七月考取第四中山大學，（北伐後第一次改名）前後六七年間，均在中大母校見聞較多。我初到南京，年齡最輕，不過十四五歲，那時無論東

大及附中，入學考試極爲嚴格，英漢算三門主科，極爲重要，尤其國文試題，甚爲高深，題旨往往出自史漢，所以國文程度不好的，易於名落孫山，我報考東大附中高一插班，也是試試看的性質，毫無把握。考過覺得平平，插班生僅取十五名，有六七百人參加考試。我覺得希望極少，馬上回到安慶再報考他校，記得已經報名安慶高中，將要考試的前一天，忽然在報上看到東大附中高一我已錄取，出乎意料之外，高興異常，遂取消了安慶考試，回家準備行李到南京入學。事後仔細想想，我那時英漢算標準程度不錯國文尤其特長，能够錄取，不是偶然的。

秋間到東大附中上課，有一門課是在南高院即一字房大禮堂上的（那時新的大禮堂尚未建築）講臺後面牆上，懸有木質對聯一付，藍底金字

，極爲耀目聯語是「東被文明，南州冠冕，大師陶冶，學海源泉」剛好把東南大學四字嵌入每句第一字，到了中大時期，就不見此聯，殊爲可惜，此時大學部國學大師極多，除王伯沅、姚仲黃、柳翼謀、姚明輝諸先生外，我印象最深刻的，就是泰州學派徐養秋先生，他老先生平常帶明朝的四方黑色帽，道貌岸然，真是理學大師。

十五年東大畢業典禮，那時還是號稱五省聯軍總司令孫傳芳在南京，我記得那一天，由五省聯軍總部，即後來國民政府地址，馬路兩旁佈滿雙崗士兵，直到母校體育館，代校長蔣維喬先生，迎於大門外。此時南京汽車極少，九時左右有十幾部新式汽車直駛到體育館，我站在體育館二樓後面木頭上，看見所謂孫聯帥，長袍馬褂帶瓜皮帽紅色珊瑚頂溫文儒雅，不類武人，坐在講臺